

巴黎和談與匪俄論爭的分析

邢國強

一 問題的提出

美國與北越洽談結束越戰問題，已於五月十三日在巴黎開始舉行，雖經多次會商，但由於北越代表阮春水堅持美方應無條件停炸北越及其他軍事行動，因而和談問題迄無進展。美國為求打開此一僵局，一方面致力於會外之斡旋，如透過英俄兩國幕後交涉，以日內瓦協定主持者身份進行調解，另方面則將會議內容予以擴大至東寮等國問題，以求運用多方關係，共策進行。

從和談開始以來，各方報導比較值得注意之新聞，是有關於毛共與蘇俄之間對和談之爭論與歧見問題，此一問題不僅攸關巴黎和談之前途，且對越南戰場上實際之軍事態勢，亦有相當重大的關係。

消息的來源，最初由香港「星報」在五月十一日報導毛匪澤東拒絕接見路過北平前往巴黎之北越和談代表阮春水開始，消息稱：周匪恩來在一項晚宴中，故意怠慢春水，並告訴春水說，毛澤東以及其他中共頭目，都認為河內同意和談，是一項重大的策略及外交錯誤。

五月十四日莫斯科亦有同樣的廣播：周匪恩來接見北越代表春水，並強橫地對他說：「毛主席」認為北越同意與美國舉行和談這事是錯誤的。

五月廿二日蘇俄政府指控中共利用北越作為「緩衝」，「使美國勢力遠離其邊界」，蘇俄政府機關報「消息報」指控，中共方面企圖窒息河內的作戰努力，一方面又鼓勵河內牽制美國，俾使其自己可以建立其核子武力。

六月一日蘇俄塔斯社報導：蘇共機關雜誌「共產黨員」最近一期謂：共產中國正企圖挑起蘇聯與美國的核子戰爭，並利用這機會建立其在國際的稱

巴黎和談與匪俄論爭的分析

霸地位。「這是毛派世界革命策略的主要秘密目的，『中國』統治集團正竭盡其一切力量，使越戰拖延下去，認越戰是其自己的大國政治打獵的一個原素，絕不顧及越南人民，一切社會主義陣營，和國際工人階級運動的利益，背叛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基本原則。北京領導人希望利用越戰達到其目的，使蘇聯與美國正面衝突，挑起核子戰爭，而其自身則置身事外。」

在毛共方面，自四月三日北越宣佈同意與美國會談後，即於四月五日以前華社記者口腦，加以評論，妄稱：「這是約翰遜(詹森)政府在侵越戰爭中遭到慘敗，在國內外陷入重重危機的情況下所玩弄的一個新的大騙局。……就是要用『停炸』的花招，來誘迫越南人民放下武器，向美國侵略者屈膝投降」，並攻擊蘇俄「約翰遜的這個新的『誘和』騙局，是同蘇修叛徒集團串通一起泡製出來的」；「在約翰遜這次策劃的新的陰謀中，蘇修叛徒集團又一次扮演了頭號幫兇的可恥角色」；號召「越南人民堅持打下去，打到底，一定能够把美國侵略者××一個不剩地趕出自己神聖的國土。」

四月十五日匪「人民日報」又以「圖末窮而匕首見」為文，批評和談稱「約翰遜政府之所以要大搞『和談』騙局，就是因為它處於空前未有的內外交困的境地。為了欺騙美國人民和世界人民，就在蘇修叛徒集團的密切配合和大力幫助下玩弄這一招，妄圖度過難關……祇有在戰場上徹底打敗美國侵略者，把美國××一個不剩地趕出越南國土，越南人民才能實現民族解放和祖國統一的神聖目標。」

從上述新聞報導中，客觀地說明了兩項事實：

- (一) 匪俄雙方藉巴黎和談而進行互相詆毀與攻擊。
- (二) 匪對越戰問題，認為祇有在戰場上求勝，才能結束戰爭。

二 匪俄基本路線的爭論

匪俄對越戰的論爭與分歧，並非今日開始，早在一九六六年起，雙方會一再以廣播攻擊，主要的根據，是基於國際共黨對世界革命的策略問題所引起。

共產國際自馬克思一八四八年發佈「共產黨宣言」以後，在理論與實際形勢的結合下，共產集團的世界革命戰略策略，有數次的重大的改變。在馬克思的構想中，認為一切社會現象與社會制度，是按照經濟學上的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之發展，而有一定的規律，即由於階級鬥爭的無法調和與實際政治社會的矛盾加深，必定按照唯物史觀的法則，進入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而以「知識分子」為主而組成之共產黨，其任務即在喚醒勞動者進行社會革命，以達到共產革命的目的。

此項理論後為列寧所引用，轉而以政治性的實際問題為革命的考慮因素，形成由共黨主動領導無產階級，從事職業性的武裝革命，並以「無產階級專政」的獨裁形式，進行某一國家國內的階級鬥爭與改造。在對外方面，更以革命的輸出，對歐洲各國如波蘭、芬蘭、保加利亞、奧地利、德國、匈牙利等國從事煽動與顛覆活動，以期迅速獲致共產國際的龐大發展。惟因歐洲的高度工業國家，並不如馬克思理論所啓示的，一定會很快的進入社會主義革命，換句話說，馬克思的理論，在列寧的對外政策上，已經遭受到挫折與懷疑，使列寧的西進政策，無法在一九二三年前得到預期的效果，因而，列寧研究結果，認為「歸根到底，鬥爭的結局，將取決於這個事實，即俄國、印度、中國等已成爲世界人口的絕大多數，而正是這個世界人口的大多數，最近年來，也非常迅速地捲入了爭取自己的解放的鬥爭」(註一)改以亞洲地區爲輸出革命的另一試驗場所。

史達林繼承列寧革命輸出原則，致力於東方的革命，在其「不要忘記東方」一文中指出，只有東方「纔能打破歐洲所鑄造而束縛整個世界的帝國主義的鎖鍊」。(註二)然則，史達林與列寧不同之點，除了加強對東方之革命輸出與顛覆手段外，並努力於國內工業化的迅速發展，希望爲世界共黨集團樹立一物質與精神的基地。二次大戰以後，核子戰爭的威脅，日益嚴重，

在俄共對內恢復建設的迫切需要下，在對外政策方面，不得不改採慎重的原則，逐漸趨向於守勢。黑魯曉夫雖然對史達林進行了一次殘酷的「鞭屍」，但對外政策上仍採取了史達林後期的慎重原則，進一步予以延伸，在一九五六年二月俄共第二十次大會中，宣佈以攻勢性的「和平共處」原則，代替革命輸出的武裝暴亂政策，此一轉變，遂與大陸毛共所主張的「人民戰爭」路線，發生實質上之衝突。(另外還有其他對內的理論衝突，不在本文討論之內，故不贅述。)

黑魯曉夫的「和平共處」對外政策，經過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在莫斯科召開的八十一個共黨、工黨會議通過的聲明，迄一九六六年三月廿九日俄共二十三次大會布里茲涅夫之繼續承認，在內容上值得說明的是：黑魯特別解釋「和平共處」爲俄共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則，而非屬於策略的考慮，權宜的考慮。至於俄共採取此種外交政策的原因，除了上述客觀的看法外，根據俄共自己的分析，認爲二次大戰後世界上社會主義已越出一個國家的範圍，而變成了一個世界體系，而這個體系與資本主義國家(指民主國家)已處於直接接觸的兩大陣營，一旦爆發戰爭，將爲人類帶來浩劫，深信祇要採取「和平共處」的原則，戰爭可以阻止與避免。同時，在攻的一面，俄共深信，資本主義發展而成的帝國主義，對內對外均存在着不可挽救的矛盾，這些矛盾，將促使資本主義本身之腐敗與衰弱，相反的促進共產集團的進步，爲了貫徹「和平共處」的外交原則，對各國共黨革命，將採取不同的方式進行，其中包括合法的議會鬥爭形式。黑魯曉夫並引述列寧所說的「一切民族都將走到社會主義，但是走法不完全一樣，在民主的形式方面，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形式方面，在社會生活各方面的社會主義改造的速度方面，每個民族都會有自己的特點，再沒有比『爲了唯物主義』一律用灰色給自己描繪這方面的未來，在理論上更貧乏，在實踐上更可笑了，這樣就至多不過是蘇絲達爾城的別腳繪畫而已」(註三)的一段話，來充實「和平共處」的理論基礎。總結俄共的外交措施，對世界革命的戰略原則，並無改變，野心亦未減退，唯在方式上則着重於以「和平」爲支援「反資本主義」及「民族解放」路線，並促使資本主義(民主國家)的自行「毀滅」。

與俄共採取分裂態度的是毛共「人民戰爭」對外政策，毛共認爲「各國人民之和平共存與各國人民之革命，本來是兩回事，而不是一回事，是兩個

概念而不是一個概念」(註四)，毛共雖然自始主張以「和平共存」來進行對外統戰活動，(如萬隆會議周匪恩來所提的和平五原則等)但毛共認為「假如不依人民大眾力量進行堅強的鬥爭，而和平運動又僅為高級人員之號召，或沙龍式之閒談，則和平自將成爲空洞，以至被迫向帝國主義讓步」(註五)。毛共認爲俄共以「和平共處」來防止世界戰爭的爆發，是一種幻想，因爲現代戰爭的禍根，即爲帝國主義制度，帝國主義制度與剝削階級消滅之前，各種性質之戰爭，將仍不可避免，認爲階級一日存在，則必有軍隊、武器、戰爭存在，因而得出結論，祇有加強各國內部「人民戰爭」，才能削弱帝國主義的實力，而阻遏大戰的發生。此點顯爲毛共對外侵略野心的辯護口實與不可改變的窮兵黷武思想。

其次，毛共在對外政策上與蘇俄的直接衝突的另一重要原因，爲黑魯曉夫對史達林之清算。毛匪澤東一直是史達林的忠實信徒，在史廩生前，對毛共叛亂，支援不遺餘力，根據史達林著作第七卷「中國革命論集」中，曾列有對毛共叛亂的實質的重要指示約有四項：(一)反帝反封建鬥爭。(二)必須以武裝革命打倒反革命。(三)第一階段爲全民族的統一戰線革命。(四)人民民主主義革命的基礎與內容，爲農民的農業革命。上述第(一)項爲工業落後地區革命的低級綱領。第(二)項武裝革命，即爲毛共「人民戰爭」暴力革命的來由。第(三)項爲「聯合政府」的統戰策略路線。第(四)項則爲共匪「新民主主義」及以「土地改革者」對外欺騙的陰謀。毛匪澤東爲了忠實的執行史廩的指示，乃在東南亞及非洲、拉丁美洲各地，積極推行這套與俄共「和平共處」極相違背的策略路線，這是有其根源的。

三 匪俄對越戰的爭論

匪俄雙方對越南問題的看法，完全是上述基本路線爭論之具體表現，俄共攻擊共匪的一貫說法，約有下述三方面：

(一)攻擊毛共分裂共產集團，以致影響越南問題之解決，與阻撓對越南共黨之支援：「如果強盜闖入一個人家裏，並且在那兒開始胡作非爲的話，那麼他的兄弟立刻就會援助他。但是，請涉想一下，如果在這個關頭有一個兄弟不僅不敢來向處於危難的兄弟提供各種援助，而且還與其他的兄弟鬧意見

，甚至阻撓兄弟去好好的收拾強盜和趕走强盜的話，那麼這還成什麼體統。」(註六)

(二)延長越戰對其自身有利：「首先讓我們來看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內部局勢，直到現在爲止，中國領導人，沒有能消除冒險主義政策——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所產生的經濟崩潰的後果。中國領導人所採取的糾正在一九五八年、一九五九年犯了錯誤的措施，至今還沒有得出顯著成績，而文化革命和它所引起的國內混亂現象大大加深了大躍進的不良後果……經濟上的困難當然引起各階層居民的不滿，看來中國領導理解到只有警察去鎮壓人民的不滿情緒是行不通的，因此保存國內的戰爭烽火，時而加劇國際緊張局勢，有助於中國領導人在國內鼓吹災難即將來臨的氣氛和爲自己沒有能力克服經濟危機的後果，國內政策的失算作辯護。因此越南戰爭對中國領導來說，是把所犯的錯誤和失算的責任，推在客觀因素上的最後的指望，並且在適當的時候，避免對本國人民所負的責任。」(註七)

(三)阻撓俄共對越共之支援：「毛澤東和他的集團，始終拒絕了蘇聯的建議(作者按係共同捍衛越南，嚴厲警告美國，對越南侵略負責)，而且『中國』當局對經過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運往越南民主共和國的蘇聯武器製造各種障礙。」(註八)

俄共攻擊毛匪部份，僅就以上所列資料，即可大致得一結論。至於毛共反擊俄共的內容，主要爲指斥俄共與美國勾結，共同出賣越南人民，對越南革命的曲解，以及越戰和談爲美蘇勾結的結果等，「美帝國主義先後玩弄的『停炸誘和』、『以戰迫和』、『以戰壓降』等等陰謀，沒有一次少了蘇修集團的份。」(註九)

四 越共對匪俄之適應

越共處於匪俄兩方爭論之下，正所謂「兩大之間難爲小」，當匪俄開始分裂之時，越共在應付方面，曾一再強調團結之重要性，胡曾志明對其黨徒之教導時常說：「國際團結是越南革命勝利不可缺少的因素。在國際團結事業中，我黨(指越共勞動黨)特別重視同蘇聯和蘇聯共產黨，同中國和中國共產黨的團結。」(註十)這一兩面應付的統戰政策，多年來確有相當的成

效，越共一方面自俄共處獲得大量俄援（近年俄援年值二十億），另一方面又獲得毛共的實際支援（包括經援、軍援及南方叛亂之實際指導工作）。

根據作者綜合越共歷次發表文件資料中有關對匪俄關係部份，得出如下的三點研究結論：

(一) 越共在武裝叛亂的革命戰略方面，完全走的是毛共的路線，這是毫無疑問的。在北越方面，當越共自法國政府手中奪取政權時，在軍事上是武裝的「人民戰爭」路線，在政治上是統一戰線的「越盟」路線，政府成立初期亦為「聯合政府」形式，而由越共實際控制，所依靠的正是毛共的三大法寶——黨的建設、統一戰線、與武裝叛亂。目前在南越方面利用「南方民族解放陣線」名義進行的軍事作戰，亦走的是「人民戰爭」的路線，此在北越國防部長武元甲的「人民的戰爭，人民的軍隊」一文中，說得很清楚，當前所採用的是「以游擊戰為中心的長期性的人民戰爭」。至於一般分析南越共黨（指人民革命黨）與北越政府之間在巴黎和談期間的革命路線上有出入，這一說法是值得懷疑的：因為南越共黨的一切活動，其指揮權不在南越，而在北越。北越勞動黨在南越的組織，一九六二年三月以前，分為兩個主要的單位，一為「中南區委」，一為「南部區委」，其後兩者合併為一，稱為「南部中央局」，直屬於北越勞動黨的「中央委員會」，但為混淆各方視聽起見，「南部中央局」的對外名稱，使用「越南人民革命黨」的名義，現任「人民革命黨中央委員會主席」的武志功，兼任「南方民族解放陣線」的副主席，實際身份又為河內勞動黨派駐該陣線「中央委員會」的「政委」。「南解」本身則為一統戰性組織，負責人阮友壽，乃一律師出身之傀儡。近年來北越正規軍大量南竄，其指揮權之進一步統一，當無疑義，故迄今南北越共黨之間在實際的革命路線上，可以說是完全一致的，而其軍事叛亂的後盾，則為大陸上之毛共，亦無疑問。

(二) 然則越共在北部的社會主義建設路線方面，根據北越勞動黨第一書記黎笋在歷次全會上的發言，所採取的，是「社會主義工業化與技術革命」的路線與方針，認為要建設社會主義，必先創造新的生產力，加強重工業建設，而欲加強重工業的建設，必先進行技術革命，而以思想與文化革命配合為三大重點。在農業方面，則採取高級合作社方式，增加農民財富收入，以五年計劃使農村生活達到中農的水平。（註十一）不論實際上是能否作到如越

共書面上所稱的發展實績，但按其經濟趨向，多少與俄共的社會主義建設路線相接近，並未採用毛共的「大躍進」與「人民公社」之作法。

在對外政策上，對俄共在「和平共處」聲明中有關世界兩大陣營形勢之分析部份，表示贊同，認為越共今日在亞、非、拉的資本主義薄弱一環中所進行的革命行動，是完全和莫斯科聲明中的「在現時代，決定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主要內容、主要方向和主要特點上，是世界社會主義體系，是反對帝國主義，爭取對社會主義改造的力量」原則，完全符合的。（註十二）

(三) 根據上述匪、俄、越共三方面的關係，我們再來看看這次巴黎和談的越共的基本態度，當可得出比較明朗的概念：

① 匪俄在對外政策上雖有很大歧見，但在對越共之支援方面，是採取一致的行動的。

② 巴黎和談是起於美國的「以炸迫和」，直接的威脅，是北越的社會主義建設，而不是南越的軍事叛亂。故越共在巴黎和談的動機方面，自始即着重在解除北越被炸的威脅，並進一步以日內瓦協定的有利條件，誣控美國侵略南越，迫使美國能退出越南戰場。為了達成以和談方面迫令美國對北越之停炸，加強北越之建設的恢復，以及利用日內瓦協定的有利條件，均須透過俄共方能達到目的，因而巴黎和談可以說是北越會同俄共所一致採取的策略陰謀。

③ 和談對南越之軍事作戰，並無減低現象，相反的，在越共邊打邊談的原則下，南越的軍事情勢正在日趨激烈，此對毛共言，與「人民戰爭」的軍事原則，並無違背，而毛共利用越戰加強對寮、泰、緬及馬來等地的滲透，仍在積極進行。（毛共在大陸叛亂後期，亦採邊打邊談陰謀，在華沙的大使級會談，亦已進行多年）惟在爭取越共領導權，加強共產集團內部分裂的情形下，對俄共越共會同採取的和談措施，有所不滿。

④ 北越宣佈同意和談迄今，已數度發表強硬聲明：四月廿五日北越勞動黨中委、國會常務委員會主席長征，在視察河內陳興道機器廠時，發表「必須繼續戰鬥到底」的激烈談話。五月八日胡曾志明致函「南解」主席阮友壽時強調「不怕犧牲，連續地打，廣泛出擊，奪取更大勝利」。六月四日北越國防部長武元甲接見法共「人道報」記者時稱：「全越人民將繼續作戰，直

到最後勝利」。同時，自宣佈和談以後，北越有大量物資循胡志明小徑南運，以及連續對南越一百十九處省會、城鎮，發動瘋狂砲轟與突擊等等，均說明越共的「巴黎和談」，仍是走的加強戰爭的路線，即使能够達成和議，則美國所付的代價亦必甚高。（假如不以軍事取勝，而採外交措施的話。）

五 簡單的結論

總統在「蘇俄在中國」一書中，曾經有如下的兩段話：

「國際共黨的內鬨和分裂，雖可削弱其對鐵幕以內的控制，及其對鐵幕以外的鬥爭力量，使其不能不改變其對內的控制方法和對外鬥爭的方式，以延長其征服和統治世界計劃的時間表，但他們決不因此而革除其階級性和國際性的共黨本質，亦決不會改變他們的世界革命和消滅資本主義的共同目標。換句話說，儘管國際共黨的內部進行着權力鬥爭，而其對於一般民衆及其敵人『資產階級』，是必須合力壓制和摧毀的；儘管他們鐵幕的內部發生了利害衝突及其如何自相矛盾，而其對自由世界及非共國家，仍然要共同行動來脅制和欺壓的」。（註十三）

這一段話，正可說明，匪俄對巴黎和談雖有歧見與爭論，但在支援越共一致反美的前提下，仍是一致的。

「國際共黨只圖利用敵人，而決不為敵人所利用。無論他共黨內部發生何種鬥爭，亦無論其對外遭受何種困難，任何國家或個人，若要乘機利用他，其結果必將為他所利用」。（註十四）

這一段話，正可說明，今日美國如欲利用國際共黨的內部矛盾，或者利用越共與毛匪的矛盾，希望在巴黎和談中獲得好的結論，可能有被利用的危險。何況，越戰的本質，並不在越共本身，亦不隨俄共的意旨所能左右，而主要的是毛共的窮兵黷武思想路線，即使能够在越戰上獲得暫時的休戰，而東南亞各地的火頭，將更燃燒得厲害，這是值得民主國家深刻警惕的。

註一：引自列寧「寧肯少些，但要好些」一文，列寧全集三十三卷四五四頁。

註二：引自史達林全集四冊一七一頁。

註三：黑魯曉夫講話引自列寧「論對馬克思主義的諷刺和帝國主義經濟主義」第六節。

巴黎和談與匪俄論爭的分析

註四：四十九年四月十六日偽「紅旗」雜誌「列寧主義萬歲」。

註五：四十九年八月十日偽「人民日報」社論。

註六：一九六七年三月廿七日莫斯科廣播「美國在越南的侵略與毛澤東集團醜陋的立場」。

註七：一九六七年三月二日莫斯科廣播「北京的政策和越南戰爭」（第一篇）。

註八：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八日莫斯科廣播「毛澤東集團背叛越南人民的利益」。

利益」。

註九：五十六年四月三十日偽「人民日報」社論。

註十：引自越南勞動黨中央第一書記黎笋九中全會報告「我黨國際任務中的若干問題」。

註十一：參考黎笋「社會主義工業化是全民的共同事業」與「青年是革命的骨幹」兩文。

註十二：同註十。

註十三：「蘇俄在中國」第三篇第八章。

註十四：同上。

（六月十五日脫稿）

（六月十五日脫稿）

（六月十五日脫稿）

（六月十五日脫稿）

「資料管理的理論與實務」

張澤民著

本書旨在闡述大專院校圖書、資料、企業行政等管理學系(科)，教學研究或機關、學校、圖書、資料主管，如何以科學方法，使其有計劃、有條理的完成圖書、資料管理的任務，以增進教學及行政效率為目的。全書計分二篇、十章、三十九節，都二十五萬餘言，圖表六十九幅，附錄重要參考資料十種，舉凡圖書、期刊、新聞剪紙、公文檔案、人事卡片、視聽資料等，從理論到管理方法，皆有詳細的敘述和舉例，實為大專院校教學及負責圖書資料工作主管和人員，不可或缺的一本極富參考價值的書。以模造紙二十四開精印，三百四十餘頁。

購者請電 549036 或郵撥 一四六七三號

定價 平裝 新台幣 七十元
精裝 新台幣 八十元